

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杜拉的梦

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杨韶刚 ——译

《梦的解析》的案例版+实操版，释梦巅峰之作

弗洛伊德第一部独立完整的释梦临床分析作品

终其一生所系统分析过的少数重要病例之一

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中
唯一一本非学术性长篇作品

既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
还是一份专业的案例分析，
更是一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杜拉的梦

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杨韶刚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拉的梦：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 / (奥)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杨韶刚译 .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93-6798-8

I . ①杜 … II . ①西 … ②杨 … III . ①梦 — 精神分析
IV . ① 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0011 号

策划编辑 / 责任编辑：李佳（ amberlee2014@126.com ）封面设计：仙境设计

杜拉的梦：弗洛伊德亲自示范梦的解析

DULA DE MENG: FULUOYIDE QINZI SHIFAN MENG DE JIEXI

著者 / [奥]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译者 / 杨韶刚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 6 字数 / 115 千

版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6798-8

定价： 32.00 元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关于本书¹

本书德文版原名《一个癔症分析的片段》(1901年1月24日完成第一稿，题目是《梦与癔症》，1925年英文译文版《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由Alix和James Strachey翻译。本文是根据1925年出版的一个校正版而译。

虽然这个病例直到1905年10月和11月才发表，但大部分内容都是1901年1月写的。重新发现弗洛伊德写给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信给我们撰写这个主题提供了大量当代的证据。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弗利斯，说他最近开始研究一位新的病人，“一个18岁的姑娘”。这个姑娘显然就是“杜

¹ 本文原载于英文版正文之前。

拉” (*Dora*)，而且，我们从这个病例本身获悉，对她的治疗在大约三个月以后，即 12 月 31 日结束。在同一年的秋天他就已经开始撰写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刻意回避：日常生活的心灵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 1 月版)，1901 年 1 月 10 日（在一封未发表的书信中）他写道，现在他正同时致力于两部著作的撰写：*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和《梦与癔症，一个分析的片段》，我们在弗洛伊德的序言中获悉，这是本文最初的标题。在 1 月 25 日（第 140 封信）中他写道：“《梦与癔症》于昨日写完。它是对一个癔症病例分析的片段，其中的解释围绕着两个梦而展开。因此它实际上是那本梦的著作的继续。（《梦的解析》是在一年前发表的。）它进一步阐述了对癔症症状的解决方法，以及对全部症状的性器官依据的考虑。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并将产生比平常更令人恐怖的影响。但是，只要一个人尽了他的职责，他所写的东西就不会成为过眼烟云。这本书已经被齐亨（*Ziehen*）所接受。”齐亨和沃尼克（*Wernicke*）一起担任《精神病与神经症月刊》的合作编辑，本文最终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几天之后，1月30日（第141封信），弗洛伊德继续写道：“我希望你不会因《梦与癔症》而感到失望。它主要关注的仍然是心理学——对梦的重要性的估计和对潜意识思维的某些独特性的解释。只能瞥见这个器官的侧面——即对性刺激敏感的躯体部位（*erotogenic zones*）和双性恋（*bisexuality*）。但是它（这个器官的侧面）被明确地提到和认识到，并且为在其他时间对它进行详尽讨论铺平了道路。这个病例是一个患有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和失声症的癔症，这种病可以追溯到吸吮手指的人的特征；在发生冲突的心理过程中主要的方面是通过被男人所吸引和被女人所

吸引之间的对立而表现出来的。”这些摘录的原话表明，本文是怎样构成了《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之间的联系的，它是对前者的回顾和对后者的展望。

2月15日（第142封信）他向弗利斯宣布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将在几天后完成，然后准备对另外两本书进行校对并送交给出版商。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进程是大不相同的。5月8日（第143封信），他已经在修改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的校对版（它是在《精神病与神经症月刊》的七月和八月这两期按时发表的）；但他现在却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出版这个病例。然而，6月19日（在另一封没有发表的信中），他报告说，“《梦和癔症》已经送交给出版商了，并将在秋季呈现在感到吃惊的公众面前”。弗洛伊德再次改变他的决心，并且又推迟了四年才出版，至于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弗洛伊德在最终于 1905 年出版这本书之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但是，所有内部的证据表明，他只做了很少的改动。当然，附录的最后一部分是增加的，以及序言的某些段落和某些脚注也是后来增补的。但是，除了这些增补之外，可以公平地认为这本书代表了弗洛伊德在出版《梦的解析》之后的那一段时期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观点。他的《性学三论》实际上几乎是和这本书同时出版的，但他的性欲理论却在出版《性学三论》之前这么多年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高度，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再者，阅读到与弗利斯的通信的读者将意识到，他的许多理论甚至早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弗洛伊德关于精神性神经症是精神倒错的“消极属性”的观点，早在 1897 年 1 月 24 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第 57 封信）中就以几乎同样的话语出现过。甚至在此之前，在 1896 年 12 月 12 日

的一封信（第 52 封信）中，就已经对这个观点做了暗示，这封信还介绍了“对性刺激敏感的躯体部位”这个概念并且勾画了“成分本能”理论的轮廓。

奇怪的是，在后来的作品中，弗洛伊德三次把他治疗杜拉的时间确定为错误的年代——确定为 1899 年而不是 1900 年。这个错误不仅出现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的第一部分，在 1923 年对杜拉的病例所增补的脚注中还重复了两次（见第 12 页注释）。毫无疑问，1900 年秋是一个正确的日期，这是因为，除了以上所引用的外部证据之外，正如这本书的结尾所说，这个日期应绝对确定为“1900 年”。

以这个病例史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这种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总结可能会使读者更容易追随本书所叙述的事件：

- 1882年 杜拉出生。
- 6岁 1888年 父亲患肺结核病，全家搬往B城居住。
- 7岁 1889年 尿床。
- 8岁 1890年 呼吸困难。
- 10岁 1892年 父亲的视网膜切除。
- 12岁 1894年 父亲意识模糊的发作。他访问弗洛伊德。
周期性偏头痛和神经性咳嗽。
- 14岁 1896年 亲吻的场面。
- 16岁 1898年初夏 杜拉第一次拜访弗洛伊德。
6月底 湖边的场景。
冬季 姑姑去世。杜拉在维也纳。
- 17岁 1899年3月 阑尾炎。
1899年秋季 全家离开B城，搬到了大厂镇。
- 18岁 1900年 全家搬往维也纳。自杀威胁。
1900年10月至12月 接受弗洛伊德治疗。
- 1901年1月 写作这个病例分析。
- 20岁 1902年4月 杜拉最后一次拜访弗洛伊德。
1905年 病例分析出版。

目录

PREFACE 序言 ... 1

CHAPTER I 第一章
临床描述 ... 13
A Clinical Description

CHAPTER II 第二章
第一个梦 ... 85
The First Dream

CHAPTER III 第三章
第二个梦 ... 129
The Second Dream

CHAPTER IV 第四章
附录 ... 155
Postscript

TRANSLATION NOTES
译后记 ... 173

PREFACE序言

1895年和1896年¹，我对癔症（*hysteria*——俗称歇斯底里症——中文译者注）症状的发病机理和在癔症中出现的心理过程提出了某些见解。从那时起，几年的时光又过去了。因此，现在提出要通过详细地报道一个病例的历史及其治疗过程来证实这些见解，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先做一些介绍性的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证明我所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合理的。另一个是，可以削弱它将引起的期待。

我被迫出版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没有任何可能使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检验和核查，尤其这些结果是如此令人吃惊，而且根本就没有令人满意的特征，这无疑很令人尴尬。但是，现在我要开始提供一些材料，使我的结论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从而使

¹ 例如，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著）中以及在《癔症的病因学》（弗洛伊德著）两本书中。——译者注

们基于对这个世界的判断而更容易理解我的结论，这样就不太尴尬了。我并不是要用这种手段来逃避人们的指责。只不过，以前人们指责的是我没有提供有关我的病人的任何信息，而现在我将要受到的指责却是，提供了不应该提供的关于我的病人的信息。我只能希望，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批评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改变了指责的借口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提前做好准备，可能会放弃接受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即使我不理会此类心胸狭窄的批评所抱有的不良意愿，对我来说，把我的这些病例分析呈现在公众面前，也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些困难部分地源自技术方面，但也部分地归咎于环境本身的性质。如果癔症紊乱的原因确实可以在病人的心理－性欲生活的亲密性中发现，如果癔症的症状确实是他们最秘密的和被压抑之愿望的表现，那么，对一个癔症案例进行完整的阐释，就必然牵涉到对这些亲密性的揭露，

就必然要背叛这些秘密。当然，如果这些病人想到他们的开诚布公有可能会被用于科学研究，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把这些秘密说出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要求他们本人同意发表他们的病例根本就没有用。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病体虚弱的人，以及那些只是有点胆怯的人，就会首先要求医生在医疗处理权限内尽职尽责，就会后悔地宣称他们不可能给科学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启示。但在我看来，医生所承担的职责不仅是针对个别病人，也针对科学；他对科学负责，最终也不过是意味着他要对许多其他病人负责，这些病人正患有此病症或者有一天会患上相同的心理失调症。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医生有责任发表他相信自己已经了解到的关于癌症的病因和结构的东西，如果他为了避免引起对某一个病人造成直接的个人伤害，就不这样做，那么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懦弱。我认为我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我的病人遭受这种伤害。我已经挑选出一个人，她的生活所在地不是维也纳，而是在一个遥远省份的城镇里，因此其个人信息在维也纳也无人知晓。我从一开始就把她接受我的治疗这个事实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秘密来保守，只有另一个医生——我完全相信其判断力的一个医生¹——才能觉察到这个姑娘是

1 毫无疑问这是指弗利斯。

我的一个病人。自从治疗结束以来我已经等待了整整四年，并且推迟发表这个病例，直到我听说这个病人的生活特点发生了某种变化，使我能够假设，现在她对所发生的某种事件的兴趣和对与此有关的心理事件的兴趣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毋庸赘言，我不提供任何姓名，以免使非医学的读者获得追踪的线索；再者，在一份纯科学技术的期刊上发表这个未经患者授权的病例，还可以保证使这位病人无法看到。诚然，如果这位病人自己的病例分析偶然落在她的手里，我当然无法避免她的痛苦。但是，从这个她毫不知情的病例中她将什么东西也了解到；她可能会自问，除了自己之外，谁还能从中发现她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呢。

我觉察到——至少在这座城市——有许多（可能看起来很令人讨厌的）医生，他们之所以选择阅读这类病例分析，不是为了对神经症的心理病理学有所贡献，而是为了他们的个人享乐，并将之作为一种用虚拟手法书写的真人真事小说 (*roman à clef*)。我可以向这类读者保证，我会在未来有机会发表的每一个病例史中都通过类似的保守秘密的方式，保证患者的信息不会被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所察觉，即便这种解决方式必定会对我所选择的材料造成相当不同寻常的限制。

现在，在这个病例分析中——这是迄今为止我成功地突破医学处理权限和不适当的环境所施加的诸多限制后而提交的唯一一个病例——对性的问题将尽可能开诚布公地进行讨

论，对性器官和性生活的功能将用适当的名称来称谓，心灵纯洁的读者从我的描述中就能够确信，即使是对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我也已经毫不犹豫地用这种语言来谈论这些主题了。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进行自我保护吗？我只要宣称我有妇科医生的权利就行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拥有那些更普遍得多的权利——而且我还要补充说，如果设想这种谈话是使性欲望得到兴奋或满足的一种很好的手段，那就标志着这是一种怪异的和邪恶的欲望。至于其他问题，我觉得可以借用别人说过的几句话来表达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在一项科学的研究中为诸如此类的主张和宣言留出空间，那是很可叹的；但是，不要让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指责我，而是相反，要指责这个时代的精神，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我们才使事情达到了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再也没有一本严肃的书能够保证留存下来。”（Schmidt, 1902 年，序言）

现在，我将描述一下我在起草这个病例史的报告时采取了怎样的方式来克服那些技术上的（*technical*）困难。当医生不得不在一天里进行六到八次这种心理治疗的处理，而且实际上在与病人进行面询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做笔记，因为害怕这样会动摇病人的信心，会干扰他自己对正在观察的材料的看法时，这些困难确实是非常大的。的确，我还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发表，怎样把一个长期治疗的病例史记录下来。至于现在的这个病例，已经有两种情况对我提供了帮助。